

复旦大学儒学文化
研究中心丛书

识仁与定性

——工夫论视域下的程明道哲学研究

郭晓东 著

 復旦大學 出版社
www.fudanpress.com.cn

复旦大学儒学文化
研究中心丛书

识仁与定性

——工夫论视域下的程明道哲学研究

郭晓东 著

復旦大學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识仁与定性——工夫论视域下的程明道哲学研究/郭晓东著.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10
(复旦大学儒学文化研究中心丛书)
ISBN 7-309-05175-0

I. 识… II. 郭… III. 程颢(1032~1085)-哲学思想-
研究 IV. B244.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115404号

识仁与定性——工夫论视域下的程明道哲学研究
郭晓东 著

出版发行 复旦大学出版社 上海市国权路579号 邮编200433
86-21-65642857(门市零售)
86-21-65118853(团体订购) 86-21-65109143(外埠邮购)
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责任编辑 陈士强
总编辑 高若海
出品人 贺圣遂

印刷 上海肖华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7.625
字数 191千
版次 2006年10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3 100

书号 ISBN 7-309-05175-0/B·250
定价 15.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内 容 提 要

本书是对北宋哲学家程颢(明道)思想的一项专题研究。作者力图以工夫论为基本视角,通过对程颢思想中本体论、心性论与工夫论三个方面的解读及其相互关系的分析,对程明道哲学进行一次新的诠释。本书认为,这三者之间并非是各自独立、互不相干的部分,而是一个相互关联的整体。对本体的体悟决定了工夫应有的路数;从工夫的路数中又反过来可以彰显出其所体悟的本体;而心性论则是本体论与工夫论的中介。本体并非是悬空的体悟,而是落实在对心性的理解上,只有对心性问题的穷深极微,所下的工夫也才有所依托。本书认为,明道哲学最大的特色就在于工夫论,即《识仁篇》中所说的“学者须先识仁”之意。在明道看来,识仁不仅仅只是体认本体,体认本体本身就是一种工夫,本体与工夫是二而一的。这正是明道与伊川朱子之学的差异所在,也是明道学影响后世最为深远的地方之一。

《儒学文化研究中心丛书》
编委会

编 委(以中文姓氏拼音为序):

陈 来 陈卫平 杜维明 甘 阳

郭齐勇 李明辉 吴 震 小岛毅

徐洪兴(主编) 杨国荣 张汝伦

谢序：当代儒学研究的意义

谢遐龄

郭晓东的博士论文终于出版了。这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他让我为他写个序言，作为导师，不便推辞。其实，他做此论文时，从我处所得指导不多，他的意思大概是纪念与我师生一场之情谊罢了。此文成就，除了得自他自己的刻苦努力、潘富恩先生的指点，就是复旦大学哲学系的良好环境。改革开放以后，复旦大学哲学系逐渐形成借精研西方哲学追究哲学基础和哲学基本概念的良好学风，马克思哲学研究迅速开出新局面，中国哲学研究也日益呈现新面貌。在这样一个环境中，晓东以他的敏锐眼光、善于感悟重要论题的天分，自然能抓住当代儒学研究中的好题目。

儒学研究能成为中国哲学研究中的显学，并在哲学界以外产生影响，值得作个解释。这就是说，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何以在现代化浪潮滚滚翻腾的今日中国，会有一部分优秀学子把自己的生命投入儒学研究，并以此名家。

当代儒学研究中有两个根本问题：一是以儒学为主干的中国传统思想为基础整理各种思潮；二是无论重建或者摒弃形而上学，均须有助于道德实践。

鸦片战争以来的近两个世纪中，中国社会思潮激荡、动乱频仍。学者们大都认为，中国社会动荡的原因，固然有自身历史中原有问题所引发，而主要原因是外来的西方文明与本土文明的冲突。我个人认为，有两个要点为众多学者所忽视。第一个要点是：近

两个世纪的历史已经证明，西方化道路是一条走不通的路。中华民族优秀分子先是学西方，走不通；而后学俄国，又走不通。能够取得共识而且实践成功的，都是从中国国情出发。第二个要点是：尽管上述事实明明白白地摆在大家眼前，仍然不能取得中华民族优秀分子全体一致的同意，仍然有一部分优秀分子主张彻底学西方。何谓“彻底”？曰：之所以举步维艰，是因为没有彻底学西方；彻底了，就顺畅了。再问：何以会不彻底？答曰：有私利在焉。这样的理论是很肤浅的，没有把道理讲透彻；社会后果也不佳。

我已经证明，中华民族彻底学西方是不可能的。我们可以向其他社会学到很多东西，但其他社会的根本性的、精神性的东西，我们是学不会的。就像一个人（在医学足够发达时）可以移植另一个人的手、脚、脸、心脏、肾脏等，但无法移植其人格、灵魂，一个社会无法移植另一个社会的生活态度、价值体系、道德体系、宗教的和哲学的精神。一个社会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法律制度、社会制度等与价值观念、道德体系、宗教精神是联为一体的；我们不可能舍弃西方社会的价值、道德、精神，单纯引进其“物质性的”经济的、政治的、法律的、社会的制度。

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我判定，中国社会的动乱和思潮激荡，涉及中西文明冲突的，主要原因是学习西方的“求彻底”论。

这是我十几年前的认识。这一认识是否定性质的论断，是不够的。需要有肯定性质的理论确定方向。要建设肯定性质的理论，须从哲学入手。

中国哲学史给我们一个启示：在佛学、玄学兴盛之后，出现新儒学繁盛；而新儒学大师大都早年精通佛学、玄学。宋明新儒学可以看作中国本土思想消化、吸收、整合外来文化的成熟和完成阶段。那么，当代新儒学兴起是否提示我们，我们当代的中国思想研究者仍然要站在中国本土思想的基地上消化、吸收、整合外来的西方文化，并且这一过程目前已经进展到较高级的阶段？

虽然一般说来历史不会简单重复，这里遇到的问题是，人们一般公认的，中国社会、中国文化之稳固性。这种稳固性不是用“超稳定结构”之类的肤浅说法能够解释的，而要探及中国思想的深处，从中国普通民众的根本生活态度中找出根据。如果发现中国人民的生活态度是稳固不变的，就可以确认中国社会、中国文化中有着稳固不变的基本要素；那就可以确认，我们这些当代中国的研究者们有着与宋明儒学者相同的处境。

近现代历史已经昭示，外来思想，即使是最先进的思想，也必须中国化，才会成就功业。中国哲学研究面对西方哲学之强势进取，已经产生出“当代新儒学”作为反应，并产生了诸如梁漱溟、熊十力、冯友兰、牟宗三、唐君毅等一批大家，这个名单还没有包括以中国本土思想消化吸收西方哲学的其他大家如梁启超、章太炎、金岳霖、贺麟等。

所以，是否要以儒学为主干的中国本土传统整理外来思想，必须作出回答。

第二个问题是：西方哲学对中国传统最大冲击在何处？曾经有一段时间部分学者的注意力集中在认识论或知识理论领域。其实，相关问题在中国的佛学典籍中有极其丰富的材料，对中国学者而言，并不成为难题。对中国而言，西方思想最大冲击在道德哲学、实践哲学方面。在中国社会、中国文化的传统中没有权利概念及相应的社会存在，而现行的法律、行政却以权利概念及其对应的社会存在为根据建立。怎样以中国人民的生活现实、生活态度、生活方式为依据，从中国哲学资料中找到根据，建立权利哲学，是当代中国哲学研究者的重要使命。

道德哲学更是个大难题。虽然不能把目前存在的道德不良状况归咎于哲学研究，毕竟哲学研究未能提供完善的道德哲学是个事实。鉴于古代中国社会精英以儒学为意识形态并身体力行，恪守“修身”传统应该是当代中国兴旺发达的基础。当代中国在道德

上面临两个重大问题,其一是精英分子须痛下功夫修身,成为全民族道德楷模;其二是在全球化进程中中国哲学要参与塑造全球理念,并进入全球道德话语之主流。这是中国哲学研究特别是儒学研究要着重用力的题目。

无论权利哲学还是道德哲学,都涉及是否须要重建形而上学这个大问题。宋明新儒学以周敦颐为首倡,意义在于他提出的问题是建立形而上学。原本的中国传统思想不考虑形而上学。新儒学新在首倡形而上学。这是在佛学挑战下,吸收佛学构造,从中国传统资料中找到一点材料作为依据模仿佛学创建的。西方哲学中既有主张形而上学的流派,也有摒弃形而上学的流派;儒学典籍中既有主张形而上学的资料,也有摒弃形而上学的资料。权利哲学或许不得不依据形而上学,否则难以建立,但道德哲学却可以建基于形而上学,也可以摒弃形而上学地建立……中国哲学研究将出现一片繁荣景象。

晓东这篇论文显示了他深厚的功力,提出了许多有创见的观点。把程颢哲学作为新儒学的一个重要节点表出,有力地抓住了宋明新儒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论题。更重要的是,本书突出了工夫论在宋明道学中的地位,阐明在宋明道学创建形而上学(文中称之为“本体”之学、本体论)之初即与工夫论成为两个基本视域,二者相辅相成且以工夫论为重心,这无疑是富有洞见的。他的研究结果对于今日中国哲学研究面临的主要问题有很好的参考价值。

晓东这篇论文得力于他对重要的西方哲学流派有较好了解。近30年来中国哲学界对西方哲学已有深入、准确的解读,研究面也拓广许多;中国哲学研究在西方哲学的刺激、启发下已经开出新局。我期待着晓东新的力作。

自序

本书是对程颢哲学所作的一项专题性研究。

在儒学发展史上,宋代是一个伟大的时代。儒学在经历近千年的式微之后,终于在北宋中叶重新恢复了其昔日的荣光,在面对佛、老两教严峻挑战的情势下,出现了周敦颐(字茂叔,学者称濂溪先生,1017—1073)、张载(字子厚,学者称横渠先生,1020—1077)、程颢(字伯淳,学者称明道先生,1032—1085)、程颐(字正叔,学者称伊川先生,1033—1107)等一批大儒,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道学运动,从而有力地捍卫了儒学的尊严。正是这场道学运动,使得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得以生生不息,传承至今,可谓是居功至伟。而在这场运动中,二程夫子明道先生程颢、伊川先生程颐居于核心的地位。从北宋中叶起,二程兄弟讲学于伊洛之滨,遂开启了宋明道学的六百年传统。

现代学术兴起之后,二程哲学研究一直是宋明道学研究中的老问题,冯友兰、姚名达、管道中、何炳松、蔡咏春、牟宗三、唐君毅、葛瑞汉、市川安司、徐远和、潘富恩等前辈学者都有相当有分量的著作传世,徐洪兴、庞万里、卢连章、刘象彬、张永儒、张德麟、钟彩均、温伟耀等当代学者也都做出了不俗的成绩。尽管如此,在道学研究领域,二程哲学同时又似乎是最薄弱的环节之一。长期以来,二程思想被掩盖在朱子的光芒之下,正如温伟耀博士所说的:“论者倾向于把二程思想只视为一种过渡的阶段,而以为朱熹的理学系统足可以取代他们的贡献。故百余年来,对二程思想作独立研

究的并不太多。大部分的论述,只限于在一般中国哲学史关于北宋理学开始时期的讨论中简略提及。”^①这应该说是客观的事实,我们可以看到,直至今天,学者们对于二程哲学的诸多观点仍然无法取得一些基本的共识。

较之二程研究的薄弱状况而言,对程明道的专门研究更是鲜有人涉及。程明道在道学系统中地位极高,后人无不尊崇。但长期以来,人们或者二程并称,或程朱并称,往往以伊川、朱子之学上来窥明道,明道之学遂淹没而不彰。事实上,明道之学非但不同于伊川,与朱子亦大异其趣,我们不可不加以考察。早在20世纪30年代,冯友兰先生在所著《中国哲学史》中,将明道思想与伊川思想区别开来,认为明道开出陆王心学一脉而伊川开出朱子一派,这一观点对于道学研究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贡献,可惜冯先生没有进一步深入地研究。第二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研究成果是牟宗三先生的《心体与性体》。在《心体与性体》中,牟先生根据自己对道学的理解,极力表彰了明道在道学史上的地位与意义,认为唯有明道才是“真相应先秦儒家之响应而直下通而为一之者”^②。从而以之为道学之正宗,而伊川朱子一系反而成了“别子为宗”。牟先生之说提出后,一方面如论者所言,“程明道的地位被大大提高”^③,受到了越来越多学者的重视,另一方面明道研究也得到了极大的深化,其有功于学术极大。牟先生昭代大儒,其说于宋明道学研究之影响当极为深远,我们可以不同意牟先生的许多论点,但生于牟先生之后,对宋明道学的研究事实上已经不可能绕过牟先生,不管是赞成他还是反对他。牟先生之后,港台牟门弟子无不视师说为定论,视先生为无上权威,从而在明道学研究中并未有开拓性的成就,如

① 温伟耀:《成圣之道——北宋二程修养工夫论之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页。

② 牟宗三:《心体与性体》,第一册,台北正中书局1968/1969年版,第44页。

③ 温伟耀:《成圣之道——北宋二程修养工夫论之研究》,第8页。

张德麟先生著有《程明道思想研究》，但基本上是重复师说，他自己也承认，只是“顺着牟师宗三的思路，广搜资料，详加分疏，以期对明道学之研究更能普及与专精”^①。然而，既囿于师门成说，普及则普及矣，专精则未必然。职是之故，虽然牟先生将明道研究推向一个高峰，但在后牟宗三时代，明道研究又处于一个停滞的状态。

就研究的角度而言，传统上对二程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对二程哲学中的概念范畴分析，特别集中于对理、气、心、性等形而上方面的研究，基本上都是在有关“本体”的问题上立论，相较而言，从工夫论的视角讨论二程哲学的则比较薄弱。牟宗三先生的《心体与性体》虽然多少涉及工夫论问题，提出了许多富有洞见的观点，但总的来说仍然未摆脱“本体论”的思维模式。唐君毅先生的《中国哲学原论·原教篇》与钟彩钧的《二程圣人之学研究》，对二程的工夫论作了部分的讨论。香港学者温伟耀最近有《成圣之道：北宋二程修养工夫论之研究》问世，这是二程工夫论思想研究的最主要著作。但总的来说，上述研究在对程氏学术的整体把握上仍有不尽如意之处，二程思想中工夫与本体、心性关系的讨论也不够充分，本体、心性、工夫诸关系往往被割裂开来讨论。此外，二程工夫异同与整个宋明道学源流之关系也未展开讨论。

其实，对于宋代的新儒家来说，本体论的建构与心性论的讨论都离不开工夫问题。对于他们而言，存在着两个最为基本的问题：第一，何以可能成为圣人？第二，如何成为圣人？对于第一个问题，道学家主要从心性本体论上予以了回答，而对于第二个问题，则主要从工夫论上回答。一般来说，本体论与工夫论构成了道学研究的两个最基本视域，二者相辅相成，对本体的体悟决定了工夫应有的路数，而从工夫的路数中又反过来可以彰显与证成其所体悟出来的本体。从某种意义上说，工夫甚至更为重要。正如蒋庆

^① 张德麟：《程明道思想研究》，台北学生书局1986年版，自序，第1页。

先生所说：“‘心性儒学’所要解决的是‘工夫’的问题。因‘心性儒学’是生命的实践之学，非‘工夫’不能达‘本体’，只有通过‘工夫’达于‘本体’才能安立生命的意义与价值，故‘心性儒学’不是当代新儒学所说的道德形上学，更不能把‘心性’看作一个形而上学的抽象概念而消解‘工夫’问题。”^①蒋庆先生虽然以鼓吹“政治儒学”说名家，但他对“工夫”与“本体”关系的这一论述仍极到位。温伟耀先生也指出：“经过魏晋、隋唐道佛两家的刺激，宋明儒对人心负面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就不能再空洞地只谈道德生命的理想，而是要落实在细密的道德修养工夫论上。而事实上，自我修养的工夫，如何成为圣人的研究，正是宋明儒学最独特的成就和贡献。”^②然而，长期以来学术界对宋明儒学的研究往往过于强调本体而忽视工夫，遂造成不小的偏颇。特别是从宋明儒学之源流的整体考察来说，工夫论更是问题的关键，在宋代道学家的对话与辩论中，大量的讨论围绕的是工夫问题，而不是仅仅局限于本体问题，同时，几乎绝大多数有关本体心性上的义理分歧往往与工夫上的分歧有着相当大的关系。因此，工夫论必须被看作道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视角。本书就试图以此作为切入点，对明道哲学重新作一翻梳理与诠释。

本书包括导论、本论与余论三部分。导论概要地叙述了程颢哲学乃至整个宋明道学产生的思想史背景，认为汉唐以来儒家经学的式微与隋唐时期佛、道两教的挑战导致了宋明道学运动的兴起，同时着重指出，北宋道学的兴起，其主要目的在于如何通过传统经典进行新的解释与发挥，从而恢复人们对中国文化传统之自觉，并以此解决新时代的新问题。我们认为，宋儒对道统传承之

① 蒋庆：《政治儒学：当代儒学的转向、特质与发展》，北京三联书店 2003 年版，第 4 页。

② 温伟耀：《成圣之道——北宋二程修养工夫论之研究》，第 1 页。

自觉的意义在于此,本课题研究的根本意义也在于此。

本论部分共分四章。第一章简单地介绍了程明道的生平、学术渊源及其在思想史上的地位,同时对程明道的著作作了简要的考释,并集中讨论了二程语录简别过程中应该注意的问题。第二章至第四章构成了本书的主体部分,它分别由三大部分组成:即本体论、心性论与工夫论。本书通过对这三个方面相互关系的分析来对程明道的哲学进行一次新的诠释,并试图以此提出一个解读宋明道学的新视角。本书认为,这三者之间并非是各自独立互不相干的部分,而是一个相互关联水乳交融的整体。通过对明道哲学的个案分析,本书认为,本体论为工夫之成立确立了基本的根据,同时工夫论又反过来证成其作为根据的本体论。而心性论在某种意义上说则是本体论与工夫论之中介。本体非悬空地体悟,而是落实于对心性的理解上;只有对心性问题的穷深极微,所下的工夫也才有所依托。具体地说,这三部分内容大略如下:

第二章主要讨论了程明道的天道天理观。本章首先探讨了明道之前关于“理”与“天理”的学说,通过比较分析来凸明显道所赋予“天理”的新的内含。其次,本章着重分析了明道哲学中易、道、神等概念,指出明道对天道的体悟主要是从《易传》入手,而“易”这一概念对于明道来说并不仅仅指《易》这部书,它有更深的内涵。对明道来说,“易体”代表了“天道”本身。这一点尤其值得重视,“易”之变动不居意味着天道本体之生生不息,“易”之生生化化之妙用则为“神”,“易”与“神”,实为一体之两面,“易体”必显“神用”,“神用”之外别无其他独立存在的实体,“神用”即是“易体”。因此,道与器,形上与形下之间并不殊绝,明道向世人展示的是一种“道器一元论”的思想,但本书同时指出,道器虽然一元,但其重心在“道”,明道真正的意图在于提醒人们,既不要执“器”以为“道”,也不要离“器”抽象地说“道”。在此基础上,我们正面阐释了明道的天理观。本书认为,明道对中国哲学史的一大贡献是正式确立了

天理的本体地位。相对于天道而言,天理一词则更加扣紧人伦日用,使得天与人在本体论上实现了完全的统一,这样,明道也就从正面为其工夫论确立了本体论的依据。

第三章主要通过对程明道“生之谓性”说的疏解来讨论明道的心性论。本章认为,明道“生之谓性”说虽然借用告子之成说而实不同于告子,明道不取告子生之自然谓性义,而是以《中庸》“天命之谓性”义来阐释“生之谓性”,这样,所谓的“性”对明道来说就是一种“本然之性”而非“自然之性”,同时,“本然之性”以“生”为名,则赋予这种天命之性生生不息、如如呈现、无不遍在之义。通过这种新的诠释,我们可以看到:第一,明道建立起一种性气不二之说,所谓“性即气,气即性”;第二,天道生生相继成善,则本然之善不与恶对而又涵摄伦理意义上的善恶在内,故明道颇引人争议的“恶亦不可不谓之性”的说法也就可以得到合乎逻辑的解释。本书进而指出,明道之论“心”,一方面发挥孟子之说,但更重要的是以《易传》、《中庸》来会通《论语》、《孟子》,从而对于明道来说,心性不二,本心即是性体,这样,我们也可以归结到工夫论上,即对作为本体之性体的体认,也就落实在对本心的工夫上。

第四章集中通过对程明道《识仁篇》与《定性书》两篇文献的分析与疏解,着重讨论了明道的工夫理论。本章指出,明道工夫论最大的特色在于提出“识仁”之工夫。《识仁篇》中谓“学者须先识仁”,正式确立了程明道的工夫说以体认本体为入手处,即本体即是工夫,即工夫即是本体。《定性书》所探讨的“定”,不在于强制本心,也不在驱逐外诱,只要随顺天理,而要达到这一境界,关键在于能否实下“廓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之工夫。这种“廓然大公”之工夫,也就是“识仁”之工夫。“识仁”与“定性”代表了明道工夫说之全体,其所谓体认本体不仅仅只是悬空地体认本体,体认本体本身就意味着是一种工夫,本体与工夫是二而一。这一点可以说是明道学的血脉所在,也是明道哲学影响后世最为深远的地方之一,

同时,本书认为,明道与伊川、朱子之学最大的差异所在,也即表现在这一点上。

本书的第三部分为余论,主要讨论了明道哲学的传承与流变。二程子没后,程门弟子弘传师学不断,其中最为著名且最有代表性的有谢上蔡与杨龟山两先生。本书认为,杨、谢所传,基本上是明道学而非伊川学,这集中表现在工夫论上,他们均承继了明道“识仁”的工夫路径,主张以体认本体作为下手工夫。受上蔡深刻影响的有湖湘学派,湖湘学者也同样沿着这样的一条工夫路径而承袭了明道的学说。而龟山道南门下三传之后有朱子,但朱子实际上并不传道南之学,朱子之成学是由伊川的问题而来,所传的基本是伊川学,他对明道的工夫论尤为不契,认为只能以下学而上达为学者的工夫。这一部分的最后还讨论了与朱子同时的陆象山。本书认为,陆学与二程学虽然没有明确的师承关系,但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洛学的影响,并且自觉地取法了明道的工夫学说。由此可以看出,二程之学在传承与流变过程中,因所传的工夫论不同,出现了门户分立的现象,则工夫论实可以视为研究宋明道学分系的一个重要向度。

总而言之,本书尽管只是程明道哲学的个案研究,并不是单纯就明道而述明道,而是在思想史的整体中来进行研究。我们一方面强调一种共时性的研究,将明道思想与同时代的横渠、伊川等作横向比较,以突出明道哲学的特色所在;同时,我们又将之置于历时性的序列中加以考察,既分析了明道思想产生的历史渊源,又叙述了明道哲学的传承与流变,从而揭示出明道学在思想史中的地位与作用。

目 录

谢序：当代儒学研究的意义(谢遐龄)	1
自序	1
导言：略论程明道哲学产生的思想背景及道学与道统的 关系	1
第一节 汉唐以来儒家经学的式微与唐宋儒者对经学的 反思	1
第二节 唐宋儒者对异端之学的排斥及概论道学与佛学的 关系	7
一、佛、道两教的挑战与唐宋儒者对异端之学的排斥	7
二、概论道学与佛教之关系	11
第三节 道学与道统	14
第一章 程明道的生平、学行与著作	22
第一节 明道的生平与学行	22
一、明道的生平与政绩	22
二、明道之成学及其对道统的绍续	27
三、明道之气象	32
第二节 明道著作的考释及二程语录简别中的若干问题	34
一、明道基本著作的考释	34